



新闻出版总署

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复兴之路

FUXINGZHILU

孔德生 张淑东 王新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复兴之路

孔德生 张淑东 王 新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兴之路 / 孔德生, 张淑东, 王新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206-09266-4

I. ①复…

II. ①孔… ②张… ③王…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近现代

IV. ①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6666号

复兴之路

策 划: 王 新

责任编辑: 刘文辉

著 者: 孔德生 张淑东 王 新

封面设计: 张 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90mm×1000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0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9266-4

版 次: 2013年1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篇 救亡图存

列强入侵 / 003

救国探索 / 009

第二篇 浴血奋战

开天辟地 / 021

星火燎原 / 024

八年抗战 / 031

解放战争 / 033

第三篇 开国创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039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 041

曲折发展 / 049

第四篇 改革开放

伟大的历史转折 / 059

改革全面展开 / 063

扩大对外开放 / 073

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078

第五篇 科学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091

中国奇迹 / 099

文明大国的和平崛起 / 103

中国道路 / 116



第一篇

救亡图存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曾创造过彪炳全球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足迹。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进入18世纪，当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和发展之际，中国却仍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无数中华儿女、仁人志士开始了探索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之路。



紫禁城太和殿

列强入侵

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竭力扩张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英国为了获取暴利，改变对华贸易长期的入超状态，这个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居然在对华贸易中使用了一种特殊商品——鸦片，以此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4亿银元。英国的鸦片走私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而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1839年6月3日，清政府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将收缴英、美等国的2万多箱鸦片在广东虎门海滩全部销毁，史称“虎门销烟”。禁烟措施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但英国政府却借口中国禁烟损害其外贸收入，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1840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入侵中国，封锁了珠江口和广东海面，并继续北上。此后两年中，清政府屡战屡



1898年所绘的时局图，形象地反映出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局面。

图中虎代表英国，蛤蟆代表法国，蛇代表德国，熊代表沙俄，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

败，最终被迫议和。在这场从海上而来的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败下阵来。1842年8月，中英两国代表在南京签订的以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白银等为主要内容的《南京条约》，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逼迫下所遭受的屈辱。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一些领土被割让出去，而且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在中国强占租界。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历史的发展至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以及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中国人民不断兴起反抗的浪潮。从1842年到1850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达到百次以上。1851年，反抗清政府统治和西方列强入侵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场农民起义不仅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极大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而且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然而，这场历时14年的农民起义却被中外反动势力残酷地镇压了。

疯狂的殖民主义扩张没有给清王朝喘息的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危机再次从海上而来，1856年秋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18日，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抢劫并焚毁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强盗们燃起的大火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伤痕，也焚毁了中国士大夫心头虚幻的“上国尊严”。

1894年，中国的近邻日本趁着中国的藩国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机，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援朝运兵船只发动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未能御敌于海上，这支在洋务运动中装备起来的舰队最终全军覆没，中国陆军更是一败再败。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1899年至1900年，中国大地上又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异常惊恐。1900年5月28日，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正式决定，联合调兵入京镇压义和团，随即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在20世纪的第一年即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一时间，中国的首都插着的是八个国家的旗帜。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相当于当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5倍，并规定列强可以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周围12处重要位置驻军。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此，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总数高达7.245亿两白银，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条款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清王朝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对内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的腐朽没落的政府。《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

中国是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它既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合压榨下所形成的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而又保持形式上或名义上独立自主的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使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发生扭曲，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一时期的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着中国经济命脉，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外贸。列强凭借着上千条不平等条约所给予的“特权”，使中华五千年积累的社会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亿万中国人

民的血汗几乎被榨尽吸干，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枯竭、弱不禁风。

（二）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虽然因遭受侵略而开始解体，但是封建剥削制度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据优势，并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然而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

（三）官僚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垄断中国经济命脉、搜刮中国人民、压抑民族资本发展的又一座“大山”。

（四）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不平衡。西方列强疯狂地霸占中国土地，野蛮地贩卖中国的人口，惊人地勒索中国的“赔款”，粗暴地抢占中国的市场，贪婪地攫取中国的资源，残忍地奴役中国的劳力。鲸吞蚕食，敲骨吸髓，造成了中国人民长期的贫困，造成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地区、城乡、部门之间极不平衡。这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掠夺的产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畸形经济，是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桎梏，只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掠夺，而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的健康发展。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使帝国主义列强始终没有把中国变成由其独占的殖民地。于是，他们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相勾结，间接地控制中国。正是由于中国长期受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中国的统治阶级又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为靠山，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处于长期不统一的状态。

帝国主义凭借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上千条不平等条约，割走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中国其余的领地划分势力范围：沙俄强占旅顺和大连湾，并逐步把东北全境作为它的势

力范围；德国强占胶州湾，并把山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福建及其沿海出让给其他国，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英国先后强迫清政府租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同时迫使清政府宣布不把长江流域各省割让他国，使长江流域、西藏和广东、云南的一部分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域，从而把云南和两广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国最富庶地区尽落列强之手。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在中国占领土地、划分势力范围外，还通过一次次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增设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列强在通商口岸强行设立“国中之国”的租界40余处，租界中有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行政和法律系统，不受中国政府管制，甚至还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作威作福。

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割让、霸占中国领地之外，还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内河航行权、掠夺华工权、驻军权、传教权、办学权、办报权等一系列特权，甚至还颁布了一条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权。这样，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操纵和控制，帝国主义列强正是依恃这种特权，企图永远控制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自由。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宣告结束。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救 国 探 索

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西方侵略者正处于战后休整时期，形势相对平静。这一时期，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击惊醒了，迫切地呼吁清政府要抓紧时机，进行改革。一批由中国人编写的西学书籍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林则徐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还有李兆济的《海国图记》、萧令裕的《英吉利记》、杨炳的《海录》等。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关西学书籍至少有22部。这些介绍西方及世界地理、历史情况的书籍，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使一直陶醉于“中央王国”、“天朝上国”、“中国即天下”的中国人如梦初醒。这些书籍以确证可信的地图地理知识，表明了地球的形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证明了英、法等并非围绕中国周边的蛮夷下国，而是远隔重洋、久被隔绝在地球另一端的文明强国。这种新的世界观念，打破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中华为天下中心，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央”的华夏中心观念，中国人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列强林立、充满竞争和威胁的现代世界。

这一时期的西学书籍，大胆地揭露了中国君主专制的种种弊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西方国家“广设学校”，各有所学的教育制度，介绍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和首任任期制。在这些对西方政治、法律、教育等制度的注意、羡慕和赞誉中，已经模模糊糊地反映出“放眼世界”的仁人志士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怀疑。此外，这些西学书籍还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中国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人之所以能渡海而来，敢于侵略中国并取胜，就是凭借着船坚炮利，靠着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神奇威力。而这正是中国所远不能及的，是西方独有的“长技”，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变西方人独特的“长技”为我所有。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愿望和要求。

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一度对华采取“合作政策”，出现了“中外相安，长年无事”的暂时稳定局面。在国内，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农民起义也相对沉寂3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

此时，西方列强加速发展，进入了钢铁时代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东邻日本也迅速崛起。中国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与被侵略的危险。时代再一次要求中国抓住时机大力发展。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阵营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这种机遇，认为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

变局”，他们试图移植西方近代技术之花，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急切地要在中国加速建立近代工矿业与近代海军。在他们的呼吁和推动下，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掀起的一场“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洋务运动最早引进了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创办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军工、民用等近代化企业，同时也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但是一些顽固派官僚斥变革为“以夷变夏”、“数典忘祖”；反对办新式厂矿、铁路、学校、新式陆海军，反对造船购械，反对出国留学。洋务运动的本意并非要走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而是依仗其政治权力，企图利用近代生产技术，来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地位。他们的“富强”目标，由于缺乏一套切合实际、可操作性的实施程序而陷于空幻。他们兴办的洋务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初步发展的条件下，由其政治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进行自上而上的改革，刷新内政，抵御外侮，企图把古老的封建专制国家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近代化国家。

1883年12月爆发的中法战争是法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执行的妥协投降路线，造成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中法战争的失败唤起了康有为爱国革新的激情，他毅然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不久，他又在广州设万木草堂招生讲学，介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维新思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首当其冲，率先发出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声。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得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立刻联合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皇帝万言书，痛陈《马关条约》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表明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成为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维新运动。

此后，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为了争取上层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康有为与梁启超创办了《中外纪闻》，组织了强学会，努力扩大政治影响。康有为共八次上书，主张效法俄、日，以君权厉行变法，敦促光绪帝进行变法。1898年春，在救亡图存的爱国浪潮中，康有为、梁启超又发起成立了有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僚200余人参加的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维新思潮的激荡，促使光绪帝下定变法的决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光绪帝先后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谕令，从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止，共103天，历史上称此次运动为“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目的，在经济上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为发展



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

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羁绊和皇帝专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在一片阴霾的中国，点燃了爱国与民主的火炬，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推动了思想的启蒙和解放，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链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措施，尽管没有维新派过去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内容，但新政提出的广开言路、提倡西学、裁撤旧衙门、奖励农工等措施冲击了封建官僚制度，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符合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趋向。

然而，这次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最后也没有逃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的命运。随着新政的推行和维新运动的发展，激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尤其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对维新派的猖狂反扑，政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懦弱的光绪帝惊恐万状，传密诏给康有为请求“设法相救”。维新派看到密诏后，抱头痛哭，束手无策。向英、美、日等国求助无效，求助袁世凯却被告密。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经过精心策划，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随即传旨称光绪帝患病不能理事，由她“临朝训政”，继而逮捕和屠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英、日友人帮助下逃出